

引用格式:张焕柄,张莉琴.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基于西部9省11县的调研[J].资源科学,2023,45(12):2449-2462. [Zhang H B, Zhang L Q.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employment of farmers lifted out of pover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9 provinces and 11 counties in wester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12): 2499-2462.] DOI: 10.18402/resci.2023.12.11

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

——基于西部9省11县的调研

张焕柄,张莉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目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了解脱贫农户在搬迁后能否获得就业、获得怎样的就业,能够为后续扶持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方法】本文基于2021年西部9省11县脱贫户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及工具变量法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来源、安置方式以及家庭情况的差异性影响。【结果】研究发现:①易地扶贫搬迁显著减少了脱贫户的农业劳动,而对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②将非农就业来源细分为公益性岗位就业和市场性就业发现,搬迁后脱贫农户的公益性岗位就业显著增加,而市场性就业没有明显变化。③差异性分析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公益性岗位就业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安置户中更为明显,而城镇安置户的市场性就业面临较大挑战;搬迁后,资产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家庭的公益性岗位就业显著增加,而复合缺乏型家庭的公益性岗位就业未发生明显变化;另外,不同家庭情况搬迁户的非农就业和市场性就业均没有明显变化。【结论】本文认为,搬迁农户的自主就业能力还有待增强,应坚持就业扶持和引导并重的政策思路,聚焦改善搬迁农户就业机会和技能水平,对特定搬迁群体进行分类施策及针对性帮扶,以此来激发和增强搬迁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非农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市场性就业;安置方式;家庭情况;线性概率模型

DOI: 10.18402/resci.2023.12.11

1 引言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期难度最大、投入最多的专项扶贫工程^[1],为完成脱贫攻坚历史使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十三五”期间有近1000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贫困。然而,脱贫群众迁出原住地后,面临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这一脆弱群体成为衔接期巩固脱贫成果难度最大、返贫风险最高的人群^[2],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自然成为巩固搬迁成果的重

点工作。为了提升搬迁群众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能力,2022年4月,全国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工作视频推进会强调“要切实抓好就业帮扶,把稳就业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第一要务”。搬迁群众能就业是稳得住、能致富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搬迁群众平稳过渡的主要路径^[3]。可见,脱贫农户在搬迁后能否获得就业是一个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其研究结果具有丰富的政策意涵。

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阶段,促进搬迁群众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重要的政策目标。搬得出只是发展的基础条件,能就业才是搬迁农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有研究认为搬迁将减少脱贫户的农业

收稿日期:2023-03-27 修订日期:2023-1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73)。

作者简介:张焕柄,男,山西孝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与政策。E-mail: zhb93815@qq.com

通讯作者:张莉琴,女,山西文水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与政策。E-mail: liq-zh@263.net

劳动,而对于非农就业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结合搬迁形式、搬迁户发展条件来确定;部分研究多聚焦贫困程度较低的地区,对深度贫困区域(特别是中西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搬迁群众的就业并未给予专门关注。基于此,本文聚焦西部欠发达地区,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通过讨论搬迁对不同类别非农就业的影响得到搬迁户的非农就业来源,进一步分析不同安置方式和家庭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①在研究内容上,将脱贫农户的非农就业进一步细分为公益岗位就业和市场性就业,以此探讨非农就业来源问题,目前鲜有文献分析搬迁对两种非农就业形式的影响。②在研究数据上,采用2021年西部9省区调研数据展开实证分析,这些地区的搬迁人口不仅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后续扶持的重要目标群体,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总体来看,本文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民户就业一般性影响的分析以及差异性作用的讨论,能够丰富既有对搬迁农户就业问题的研究,同时为后续扶持政策的实施及调整提供参考。

2 政策背景与分析框架

2.1 政策背景

易地扶贫搬迁是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以及实现搬迁群众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手段^[4]。易地搬迁的主要动因是为了改善部分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群体的发展条件,避免开发原居住地的高额成本,是实现脱贫的一项经济、可行的选项^[5]。这种迁移式扶贫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西”扶贫工程,宁夏西海固地区^①探索的“吊庄移民”模式开启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先河,帮助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下的人群解决了温饱问题^[6]。移民搬迁方式在三西地区取得的良好成效使其逐渐上升为全国性的政策举措。1994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易地扶贫搬迁成为开发式扶贫的重要手段,并在云南、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试点推广。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第一个扶贫十年纲要的出台^②,易地扶贫搬迁从地区试点成为一项全国性、系统性的工程。党的十八大

以来,易地搬迁成为精准扶贫、脱贫“五个一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摆脱绝对贫困战略目标的驱动下,2017年和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力度达到的高峰。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完成全960万人的搬迁安置任务,其中西部地区的搬迁人口达到779万,占全国搬迁总人口的81%。然而,对于搬迁群众来说,迁出后还面临诸多不确定风险,仍需采取帮扶措施对该群体的后续发展进行巩固提升。脱贫攻坚目标完成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和学界通过聚焦改善搬迁群众生计和提升群众福利水平,以求实现其生产生活的平稳过渡和可持续发展。

本文所关注的“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具有较强的脱贫目标导向,政策施行遵循“群众自愿、应搬尽搬”原则,是一项政府主导、群众自愿的移民搬迁工程。首先,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不是单家独户的现象,而是片区性特征,因此在脱贫目标导向的推动和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鼓励脱贫户以整村搬迁的方式迁出;其次,政府充分尊重搬迁户的搬迁意愿。易地扶贫搬迁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其中集中安置占比达到76.4%,分散安置占比为23.6%。集中安置以城镇安置和行政村就近安置为主,由政府特定区域建设安置区并配置相应的公共服务;分散安置则以插花安置为主,依托安置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空置房屋等资源,通过政府回购房屋的方式安置搬迁户。最后,易地扶贫搬迁这一浩大的工程得以推行离不开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一方面,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级扶贫部门会对潜在区域的搬迁户开展宣传和劝导工作,鼓励他们搬离生态环境恶劣地区,享受现代化的居住环境以及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中央专项资金、地方统筹金等多渠道资金为搬迁提供了充分保障,据统计,“十三五”时期易地搬迁累计投入的各类资金达到了6000亿元。此外,迁出地的建设成本过高可能预示着后续建设的不确定性,伴随着搬迁人数增加以及原有村居复垦,“同群效应”将促使贫困群众接续作出搬迁决定。

① 该地区曾被联合国认为是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② 国务院2001年6月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

2023年12月

2.2 分析框架

生态贫困理论认为生态脆弱与经济贫困高度重合,自然条件脆弱且缺乏经济资源可能导致生态与贫困的恶性循环^[7]。为了打破生态贫困循环,国际上通常使用“生态移民”的方式,将由于环境变化对生存和生活条件产生不利影响的群体迁移至新的生活区域^[8]。“生态移民”的概念内涵可以认为基本等同于中国的“迁移式扶贫”,但国外的研究更多讨论移民的生态环境效应,对经济效应的研究较少^[9]。

对于中国来说,易地扶贫搬迁肩负着全面脱贫的历史使命。搬迁有助于改善生态脆弱地区搬迁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但其成败关键在于能否为移民提供就业机会^[10]。农户在搬迁后的就业行为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农业劳动方面,搬迁农户由于同耕地距离增加、生产空间缩减等原因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概率明显降低^[11]。即便部分搬迁户的农业生产享受了产业扶持,但其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乏力、同质化严重以及联农带农能力不足的问题^[12]。搬迁后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明显减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非农化倾向。大部分研究认为搬迁对农户的非农就业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的资产数量、收入水平以及就业技能培训将显著促进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13-15]。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搬迁农户由于资金不足、文化素质不高以及就业技能缺乏等原因,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16,17],易地扶贫搬迁并未显现出对非农就业的显著促进作用^[18]。同时,新冠疫情的冲击加剧了失业问题,对搬迁户的非农就业形成挑战^[3]。

进一步,不同安置方式对搬迁户的非农就业可能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各类搬迁安置方式展开分析。首先,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搬迁方式均显著提高了农户的非农就业,其中集中安置对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小^[19],这可能因为集中安置户对补贴的福利依赖部分抵消了搬迁对非农就业的积极影响;同时,集中安置点内的劳动岗位需求与大量搬迁人口劳动技能不相匹配,从而出现非农就业不足的问题^[20]。其次,城镇和农村安置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由于城镇地区对劳动力需求更多,城镇安置户更可能从事非农就业^[21,22]。对于农村安置户来说,生产方式并未发生太

大变化,仍旧可以从事原有的农业生产及非农就业^[23,24]。还有部分学者将安置方式分为有土和无土安置,县内有土安置和无土安置均促进了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25]。此外,易地扶贫搬迁对就业的影响因搬迁户的家庭特征而异,忽略搬迁对象的特征可能影响对帮扶成效的有效认识。有研究认为,搬迁家庭的赡养负担可能对农户就业形成倒逼,使非农就业增加^[26]。还有研究考虑了致贫因素分类的家庭特征对就业的异质性作用,发现搬迁显著促进了发展能力不足家庭的生计,而对能力丧失型农户的生计影响不显著^[27]。

基于以上的文献梳理,可以勾勒出一个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对就业影响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本文基于生态贫困理论、区位理论以及劳动力流动理论,将搬迁特征(安置方式、家庭情况)和就业情况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在呈现搬迁农户农业劳动情况的同时,主要对其非农就业情况进行细致讨论。易地扶贫搬迁通过打破生态环境限制、改变区位条件为搬迁农户创造了新的发展环境。就业作为搬迁户后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脱贫农户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进行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同时,由于在搬迁过程中政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研究搬迁对就业的影响还应特别注意结合搬迁以及后续扶持政策来加以分析,本文将基于“堵”“疏”“兜”的政策条件,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说。

首先,搬迁政策堵上了搬迁农户返回原居住地就业的路径。搬迁后,农户原先的住房将依照政策规定拆旧复垦,由于缺乏生活空间以及农业劳动成本增加,搬迁户很难再回到原住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可以视作“堵”的政策条件,使搬迁户的农业劳动明显减少。搬迁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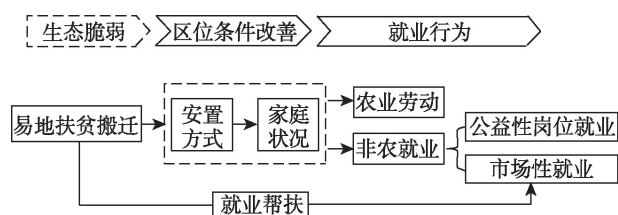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is research

脱贫农户后续发展可能具有较大挑战,他们虽然迁移到了经济社会条件更加优越的区位,但受限于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在非农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较差。鉴于此,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将在“堵”的条件下,进一步通过发挥“疏”的作用,来疏解搬迁农户的生计转换压力。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一系列政策措施完善搬迁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对搬迁群众的就业帮扶。其中,就业帮扶政策聚焦搬迁群众的发展机会,在政府后续扶持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扶贫公益性岗位是实践中比较普遍的就业帮扶措施,主要由政府根据迁入地的公共服务需求开发岗位,为就业困难的脱贫农户提供就近就地就业机会。对于搬迁农户来说,自主寻找市场就业面临较高成本,而扶贫公益性岗位有效缓解了这一困难,从而使搬迁户更可能选择从事公益性岗位就业。进一步,作为长期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建档立卡户,搬迁农户存在多重发展困境,搬迁政策在“疏”的基础上,还具有“兜”的作用。由此,需要进一步发挥公益性岗位的就业兜底功能,通过向禀赋条件匮乏的搬迁户提供公共工作,提高这些群体的发展动力和能力。可见,分析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要充分考虑现实政策条件,搬迁政策中具有“搬得出”涵义的“堵”、有“稳得住”涵义的“疏”和“兜”构成了本文的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框定了对搬迁后脱贫农户就业行为的分析思路,本文在后续内容中将对比易地扶贫搬迁的这些就业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课题组于2021年8月在西部9省11县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项调研涉及脱贫农户的村社问卷和家庭问卷,详细采集了行政村层面的人口、经济以及政策措施,以及脱贫农户的人口特征、就业收入、政策帮扶等信息。为了保证抽样的随机性,课题组采用以基于收入的分层随机抽样为主、判断抽样为辅的方式获取乡镇、村社和脱贫户数据信息。首先,在区县抽样框内将乡镇样本按照人口的总体收入情况分为高、中、低3个群组,在3个群组中分别随机选取拟调研乡镇;在此基础上,结合拟调研乡镇在区县的分布选定乡镇样

本。然后,以样本乡镇作为抽样框,采取与乡镇抽样相同的方式,按人均收入将农户分为3个组,通过组内随机抽样的方式得到调研样本村以及最终的样本脱贫户,抽样结果应兼顾农户在村域内的空间分布。另外,为了降低调研数据的测量误差,课题组在实地获取脱贫农户数据时充分参考了政府建档立卡等数据信息。经过数据清理,最终获得了1034个脱贫户样本,其中搬迁户有173户,未搬迁户有861户。

本文使用了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研究数据。首先,本文研究样本中搬迁农户占比16.73%,基本符合全国统计数据中占比,并与既有文献结果非常接近。“十三五”期间,全国有约960万易地搬迁人口,占脱贫总人口数的9.7%^[27];既有文献中搬迁脱贫户占脱贫总户数比例为15.65%~19.37%^[28,29]。其次,本文所聚焦西部地区搬迁样本能够代表全国搬迁农户的主体部分。“十三五”期间西部12省搬迁人口达到了779万人,占全国搬迁人口总数的81.15%^[30],本文所分析的西部9省区搬迁人口在西部搬迁总人口中占比达到90%以上。最后,西部地区作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的重点区域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对该地区的分析结果具有丰富的政策涵义。

3.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在分析中,将脱贫农户的家庭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核心解释变量为脱贫农户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情况,被解释变量为脱贫农户就业情况,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区县特征。

被解释变量。本文将脱贫农户家中是否有劳动力就业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关注非农就业以及农业劳动情况。非农就业包括公益性岗位就业和市场性就业,其中公益性岗位是指政府提供的帮扶性就业岗位,市场性就业是指劳动力在就业市场自主寻求的就业岗位。本文根据脱贫农户是否从事以上就业类别作出非农就业判定,若脱贫农户从事上述任一类就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在讨论非农就业来源时,将就业细分为公益性岗位就业和市场性就业,两类就业变量定义均采用上述的二值形式。脱贫农户的农业劳动通过脱贫农户耕地使

2023年12月

用情况来衡量,若家庭有正在耕种的土地,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解释变量。本文将脱贫农户是否搬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调研问卷对应问题为“您家是否属于易地搬迁户”,若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控制变量为户主和家庭特征,其中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

龄、性别、民族、健康状况及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劳动力占比、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家庭成员平均教育水平、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以及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另外,本文还控制了样本所在区县变量。

描述性统计见表1,搬迁农户从事农业劳动的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全样本 N=1034	搬迁户 N=173	非搬迁户 N=861	差异 搬迁-非搬迁
被解释变量					
非农就业	家庭中是否有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有=1,无=0	0.879 (0.326)	0.838 (0.369)	0.887 (0.316)	-0.049*
农业劳动	家庭中是否有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有=1,无=0	0.863 (0.344)	0.723 (0.449)	0.891 (0.312)	-0.168***
市场性就业	家庭中是否有劳动力从事市场性就业,有=1,无=0	0.763 (0.425)	0.705 (0.457)	0.775 (0.418)	-0.069**
公益性岗位就业	家庭中是否有劳动力从事公益性岗位就业,有=1,无=0	0.384 (0.487)	0.416 (0.494)	0.377 (0.485)	0.039
解释变量					
户主特征					
户主年龄	户主在调查年份的年龄/周岁	48.965 (8.798)	47.699 (9.205)	49.220 (8.697)	-1.520**
户主性别	户主的性别,男=1,女=0	0.914 (0.281)	0.855 (0.353)	0.926 (0.262)	-0.070***
户主民族	户主是否为少数民族,是=1,否=0	0.685 (0.465)	0.786 (0.411)	0.664 (0.472)	0.122***
户主健康状况	户主是否患有慢性病,是=1,否=0	0.175 (0.380)	0.156 (0.364)	0.179 (0.383)	0.023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5	2.208 (0.748)	1.908 (0.741)	2.268 (0.735)	-0.361***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共同生活的家庭人口数	4.373 (1.735)	4.618 (1.847)	4.324 (1.708)	0.294**
家庭劳动力占比	家庭中16~65周岁劳动力占比	0.706 (0.330)	0.660 (0.323)	0.716 (0.331)	-0.055**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周岁	36.102 (11.005)	33.340 (11.128)	36.657 (10.903)	-3.317***
家庭成员平均教育水平	家庭成员的平均教育年限	2.389 (0.641)	2.160 (0.576)	2.435 (0.644)	-0.275***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家庭成员平均患病比例	0.125 (0.217)	0.107 (0.222)	0.129 (0.216)	-0.022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亩	2.876 (4.509)	3.987 (5.790)	2.653 (4.173)	1.334***

注:括号内数值为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概率显著低于非搬迁户,这与迁出后远离农业生产资料有关。搬迁户从事非农就业的均值为0.838,显著低于非搬迁户水平;进一步,从非农就业来源看,搬迁农户从事市场性就业的概率显著低于非搬迁户,从事公益性岗位的概率高于非搬迁户。在户主特征方面,搬迁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显著高于非搬迁家庭水平;搬迁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显著低于非搬迁家庭;此外,户主为少数民族的家庭搬迁概率明显更高。在家庭特征方面,搬迁家庭平均规模约为4.618人,显著高于非搬迁家庭;搬迁户家庭16~65周岁劳动力的占比约为66.00%,显著低于非搬迁户水平;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教育水平显著低于非搬迁户,搬迁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显著多于非搬迁户。综上可知,搬迁农户人力资本水平总体上处于劣势地位。

3.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进一步识别非农就业的来源,继而讨论安置方式和家庭情况对就业的作用差异。根据研究内容和变量设置情况,本文采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在此基础上,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因果识别和差异性讨论。

3.3.1 线性概率模型(LPM)

理论上讲,在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自变量均为二值变量的情况下,应使用Probit或Logit二值选择模型。但是,相比二值选择模型,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LPM)在估计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时,无需对误差项分布作出假设^[31];同时, LPM模型在不进行预测时的结果同二值选择模型差异不大,且更为稳健^[32,33]。故本文选择LPM模型,其设定如下:

$$\text{Pro}(Emp_i = 1) = \alpha + \beta bq_i + \gamma X_i + u_i \quad (1)$$

式中: Emp_i 为脱贫家庭 i 中是否有劳动力就业的虚拟变量; bq_i 为脱贫家庭 i 是否属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虚拟变量; β 为本文关注核心变量的参数; X_i 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区域特征; γ 为控制变量系数; α 为常数项; u_i 为随机扰动项。

3.3.2 线性概率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LPM-2SLS)

在估计易地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时,不

能忽视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即个人能力等未观测因素可能对就业和易地搬迁产生影响,进而造成实证模型估计偏误。工具变量法是应对内生性问题的实用方法,它能够将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部分剥离出回归过程,进而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本文将“户籍所在村社的易地搬迁发生率”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工具变量,村社搬迁发生率与农户搬迁概率正相关,但其不会对脱贫农户非农就业产生直接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的基本条件。

基于此,本文采用线性概率工具变量模型(LPM-2SLS)进行实证估计。尽管Probit模型是适合二值因变量的模型设定,但Probit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Probit-IV)并非公认且有效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模型形式,线性概率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LPM-2SLS)的效果可能更好。IV-Probit要求第一阶段回归的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同时需要假定内生变量服从正态分布,但二值形式的易地扶贫搬迁变量并不具备这一分布特征。因此,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是一种有效替代方案^[34,35],模型形式如下:

$$bq_i = kX_i + \delta Z_i + u_i \quad (2)$$

$$Emp_i = \theta X_i + \phi bq_i + \varepsilon_i \quad (3)$$

公式(2)、(3)代表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回归模型中, Z_i 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工具变量; k 、 δ 分别为控制变量系数和工具变量系数;第二阶段模型中 θ 为控制变量系数; ϕ 为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影响的因果效应系数;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4 结果与分析

4.1 易地扶贫搬迁对就业的影响

4.1.1 基准回归结果

线性概率模型(LPM)的回归结果见表2。表中(1)~(3)列和(4)~(6)列分别以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列(1)和列(4)只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和区县控制变量,列(2)和列(5)在列(1)、(4)的基础上添加了个人特征变量,列(3)和列(6)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结果。从(1)~(3)列的结果可知,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该结果引发了后文对易地扶贫搬迁内生性及就业来源的讨论兴趣。在控制变量方面,脱贫农户家庭规模、劳动力占比以及家庭成员平均教育程度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非农就业			农业劳动		
	(1)	(2)	(3)	(4)	(5)	(6)
是否易地搬迁	-0.014 (0.031)	0.010 (0.033)	0.001 (0.033)	-0.109*** (0.027)	-0.102*** (0.029)	-0.109*** (0.029)
户主年龄		-0.002 (0.001)	-0.004*** (0.001)		0.003*** (0.001)	0.001 (0.001)
户主性别		-0.006 (0.041)	-0.022 (0.040)		0.036 (0.035)	0.017 (0.035)
户主民族		-0.088** (0.035)	-0.090** (0.035)		0.001 (0.031)	0.004 (0.032)
户主健康状况		-0.083** (0.033)	-0.038 (0.040)		-0.009 (0.025)	0.005 (0.029)
户主教育程度(未上过学=0)						
小学		0.021 (0.034)	-0.015 (0.034)		0.062** (0.027)	0.066** (0.028)
初中		0.043 (0.036)	-0.038 (0.039)		0.059* (0.031)	0.069* (0.036)
高中或中专		0.134*** (0.048)	0.042 (0.049)		0.036 (0.052)	0.046 (0.059)
大学及以上		-0.447* (0.236)	-0.565** (0.226)		0.218*** (0.065)	0.166** (0.083)
家庭规模			0.036*** (0.008)			0.019** (0.008)
家庭劳动力占比			0.126*** (0.038)			0.024 (0.034)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0.000 (0.001)			0.003** (0.001)
家庭成员平均教育水平			0.078*** (0.021)			-0.010 (0.022)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0.103 (0.087)			-0.038 (0.073)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0.002 (0.005)			0.005** (0.002)
区县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867*** (0.040)	1.035*** (0.098)	0.726*** (0.116)	1.006*** (0.013)	0.791*** (0.073)	0.687*** (0.100)
样本量	1034	1034	1034	1034	1034	1034
R ²	0.054	0.084	0.133	0.317	0.326	0.334

注:括号内数值为变量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与非农就业成正比,表明这些家庭人力资源禀赋因素显著提升了非农就业概率;另外,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列(4)-(6)的结果中,易地扶贫搬迁在1%的水平上显著减少了脱贫户的农业劳

动,搬迁农户远离农业生产资料可能导致家庭农业劳动减少。控制变量中,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平均年龄以及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对脱贫户农业劳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人口数量越多、平均年龄越大的脱贫农户家庭越可能从事农业劳动。

4.1.2 因果识别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应对易地扶贫搬迁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设置为“样本脱贫户所在村社的易地扶贫搬迁发生率”,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见表3。第一阶段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Cragg-Donald Wald F 的值为382.681,远大于经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为133.265,符合秩条件成立的基本要求。综上,本文所选工具变量有效。

线性概率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LPM-2SLS)结果见表3。列(2)中,易地扶贫搬迁在1%的水平上对脱贫户农业劳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估计系数与LPM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接近,表明搬迁减少了脱贫户的农业劳动。列(1)中,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非农就业影响的估计系数略高于表2中LPM的回归结果,但该估计结果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后文将对非农就业进行细分讨论,以此来进一步探究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来源。

4.1.3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③、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s Model, TEM)以及粗化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CEM)方法对易地扶贫搬迁的就业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PSM通过比较处理组结果与匹配的“反事实”参照组结果,得到平均处理效应。列(1)和(2)汇报了一对四邻匹配的结果,列(1)中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非农就业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列(2)中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的农业劳动有显著负向影响。TEM主要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原理来应对易地扶贫搬迁自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列(3)和(4)的估计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非农就业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对脱贫户农业劳动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CEM是一种控制可观测混杂因素的非参数方法,该方法通过改善处理组和对照组协变量分布的平衡性,从而增强两组数据之间的可比性。CEM使用原始数据直接匹配的方式符合一致性原则,相比PSM方法而言,对模型的依赖程度较小^[36]。列(5)中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列(6)中易地扶贫搬迁显著减少了脱贫户的农业劳动。综上,基于上述各种方法所得结果与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法结果接近,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结果是稳健的。

4.2 非农就业的来源

前文分析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具统计显著性。考虑到非农就业内含不同就业形式,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政府帮扶性就业、市场性就业的影响,有助于增进对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来源的认识。表5中列(1)、(2)汇报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公益性岗位就业和市场性就业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易地搬迁对脱贫农户公益性岗位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脱贫户市场性就业的影响不具统计显著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是过渡期重点工作,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搬迁户能够以相对于市场性就业更低的成本获得公益性岗位就业。由此可见,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主要来源于公益性岗位就业,而其自主性市场性就业还尚未培育起来。

4.3 差异性分析

4.3.1 安置方式差异

易地扶贫搬迁的安置方式可分为城镇和农村

表3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变量	非农就业	农业劳动
	(1)	(2)
是否易地搬迁	0.018 (0.069)	-0.130*** (0.04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县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第一阶段系数	1.257*** (0.059)	1.257*** (0.059)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446.92	446.92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133.265	133.265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382.681	382.681
常数项	0.725*** (0.115)	0.687*** (0.099)
样本量	1034	1034
R^2	0.133	0.334

③ 关于PSM匹配的平衡性检验在此不作汇报,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获取。

表4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PSM		TEM		CEM	
	非农就业 (1)	农业劳动 (2)	非农就业 (3)	农业劳动 (4)	非农就业 (5)	农业劳动 (6)
ATT(一对四匹配)	0.045 (0.039)	-0.084* (0.044)				
是否易地搬迁			0.037 (0.045)	-0.146*** (0.041)	0.040 (0.048)	-0.094** (0.045)
第一阶段结果			8.839*** (0.837)	8.839*** (0.837)		
常数项					0.802*** (0.026)	0.863*** (0.02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县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935	935	1034	1034	315	315

表5 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非农就业来源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jects 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ources of households lifted out of poverty

变量	公益性岗位就业 (1)	市场性就业 (2)
是否易地搬迁	0.169** (0.072)	-0.086 (0.07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县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447*** (0.149)	0.436*** (0.134)
样本量	1034	1034
R ²	0.166	0.176

安置,城镇安置一般位于县城周边,农村安置一般位于乡镇附近,安置地点所具有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可能对脱贫农户的非农就业产生差异化影响。城镇和农村安置的回归结果见表6,列(1)–(3)的因变量分别为城镇安置下的非农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以及市场性就业,列(4)–(6)列则是农村安置下的相应就业形式。结果表明,城镇安置户和农村安置户在搬迁后的非农就业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关于就业来源的讨论发现,城镇安置户的公益性岗位就业在1%的水平上显著增加,其市场性就业则显著减少。搬迁至城镇的脱贫农户面临较大生计转换压力,他们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不足,较难

获得市场性就业。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公益性岗位就业的促进效果在城镇安置户当中更为突出,城镇安置产生的众多公共服务需求在政府的支持下转化为公益性岗位,脱贫农户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事公益性岗位就业。另外,农村安置对搬迁户市场性就业不存在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农村安置户在搬迁后的生计方式变动程度较小,迁移至村镇从事市场性就业的情况与搬迁前差别不大。

4.3.2 家庭情况差异

易地扶贫搬迁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因脱贫农户家庭情况而异,缺乏人力资本或存在流动性约束的脱贫户在就业方面存在一定弱势,考虑搬迁农户家庭情况的分析能够为增强后续就业帮扶的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根据致贫因素对脱贫农户的家庭情况进行分类。致贫因素是脱贫攻坚期间政府对脱贫户家庭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得出的,能够有效代表脱贫户家庭经济状况的指标,该指标是脱贫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据,同时可能对农户的后续发展产生持续影响。参考既有研究^[28],本文将脱贫农户划分为人力资本缺乏型、资产缺乏型以及复合缺乏型(人力资本和资产皆缺乏)3类家庭。其中,人力资本缺乏型家庭包括因病、因残致贫,缺劳力,缺技术,发展动力不足的家庭;资产缺乏型家庭包括缺资金、缺土地的家庭;复合缺乏型家庭既有人力资本缺乏特征,又有资产缺乏特征。

基于3类家庭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7,列(1)–

表6 不同安置方式的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resettlement types

变量	城镇安置			农村安置		
	非农就业	公益性岗位就业	市场性就业	非农就业	公益性岗位就业	市场就业
	(1)	(2)	(3)	(4)	(5)	(6)
是否易地搬迁	-0.030 (0.219)	0.963*** (0.350)	-0.542* (0.292)	0.015 (0.075)	0.172** (0.078)	-0.097 (0.08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县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703*** (0.121)	0.287 (0.183)	0.445*** (0.153)	0.709*** (0.118)	0.445*** (0.151)	0.423*** (0.138)
样本量	909	909	909	986	986	986
R ²	0.153	0.049	0.111	0.136	0.171	0.180

表7 不同家庭情况的回归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family status

变量	人力资本缺乏型			资产缺乏型			复合短缺型(人力资本和资产缺乏)		
	非农就业	公益性岗位就业	市场就业	非农就业	公益性岗位就业	市场就业	非农就业	公益性岗位就业	市场就业
	(1)	(2)	(3)	(4)	(5)	(6)	(7)	(8)	(9)
是否易地搬迁	0.035 (0.088)	0.154* (0.093)	-0.040 (0.092)	0.082 (0.111)	0.242** (0.104)	-0.067 (0.135)	0.147 (0.170)	0.104 (0.245)	0.126 (0.25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县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774*** (0.137)	0.335* (0.178)	0.477*** (0.162)	0.645*** (0.219)	0.047 (0.266)	0.554** (0.267)	0.768*** (0.209)	-0.609 (0.439)	0.730* (0.386)
样本量	729	729	729	279	279	279	128	128	128
R ²	0.156	0.184	0.198	0.176	0.217	0.147	0.130	0.330	0.188

(3)汇报了易地扶贫搬迁对人力资本缺乏型家庭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人力资本缺乏型家庭的公益性岗位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非农就业和市场就业的影响不具显著性,人力资本缺乏型家庭的弱劳动力更可能获得公益性岗位就业体现了政府帮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列(4)-(6)汇报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资产缺乏型家庭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显著增加了资产缺乏型家庭的公益性岗位就业,而对其非农就业和市场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此,可以依据贫困陷阱理论作出解释,该理论认为机会获得取决于劳动者家庭初始财富,资产缺乏型家庭劳动力由于可行能力不足,较难获得市场性就业机会,只能更多依靠政府的公益性岗位帮扶。最后,列(7)-(9)汇报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复合短缺型家庭的就业影响。

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3类就业均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该类家庭存在的双重发展劣势限制了其就业获得。

5 结论、讨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是衔接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点议题,脱贫农户在搬迁后能否获得就业、能获得怎样的就业值得细致分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讨论了易地扶贫搬迁“堵”“疏”“兜”的政策条件。在此基础上,使用2021年的9省11县实地调研数据,利用线性概率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LPM-2SLS)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讨论非农就业的来源以及影响的差异性。主要结论如下:

(1)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的农业劳动具有

2023年12月

显著负向影响,而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具统计显著性。将非农就业分为公益性岗位就业和市场性就业进行细致讨论发现,搬迁后脱贫农户的公益性岗位明显增加,市场性就业没有明显变化。

(2)易地扶贫搬迁对城镇和农村安置户的公益性岗位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公益性岗位就业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安置户当中更加突出;城镇安置农户在搬迁后的市场性就业显著减少,而农村安置户的市场性就业没有明显变化。

(3)人力资本缺乏型和资产缺乏型家庭在搬迁后的公益性岗位就业显著增加,而复合缺乏型家庭的公益性岗位就业未发生明显变化;另外,各类搬迁家庭的市场性就业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5.2 讨论

为了使搬迁群众通过就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需要在保留原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培育搬迁户的非农就业能力。搬迁户农业劳动受限于耕地等生产资源不足,通过实现有意愿且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搬迁户有地可种,不仅是对搬迁群体生计方式的延续,而且还可以发挥对非农就业风险的缓冲作用^[97]。然而,搬迁农户在耕地资源获取方面仍存在一些困难:安置区内的搬迁户来自不同村社,社会关系不稳固导致在这些群体之间较难形成有效的土地流转条件;同时,安置点周边村落可能普遍存在人口流动产生的耕地撂荒问题,同样受限于社会关系不充分问题,导致搬迁农户难以从周边村落获得耕地。耕地缺乏问题导致搬迁户的农业生产发展面临较大制约。那么,推动改善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表明,搬迁农户自主性的市场性就业尚未培育起来,甚至有减少的倾向;搬迁农户虽然能够获得公益性岗位就业,但其毕竟是临时性的,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自主就业才是搬迁户发展的长久之计。本文认为,在改善搬迁户非农就业的同时,应注意发挥好政府就业帮扶的作用。

5.3 政策启示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阶段,政府应调整优化就业帮扶思路。将为搬迁农户提供就业转变为就业扶持和引导并重,注重发挥易地搬迁后续

就业帮扶的“造血”功能,以增强搬迁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自主就业能力。

(2)聚焦改善搬迁农户的就业机会和技能水平。继续为搬迁农户提供公益性岗位就业,在优化公益岗位设置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强化公益性岗位管理以推动搬迁农户基本就业能力的养成;同时,注意预防搬迁农户对公益性岗位就业的福利依赖。应通过技能培训、干中学等方式,为搬迁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就业培训内容,提高就业技能培训的到位率。此外,构建完善对搬迁农户的就业激励机制,对实现自主就业的搬迁农户给予补助和奖励,从而提高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的积极性。

(3)政策施行中应关注特定群体的就业问题,做到分类施策及针对性帮扶。首先,应为城市安置农户提供充分的就业能力提升机会,通过发挥公益性岗位的发展性功能和提供有效就业技能培训,增强城镇安置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促进该群体比较平稳地实现生计转型。其次,应为各类弱势搬迁农户提供针对性的就业帮扶,发挥公益性岗位就业对弱劳动力特征搬迁家庭的兜底保障功能,积极改善低收入搬迁家庭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能力,从而改善特殊困难家庭的生存和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伟大成就与实践经验[J]. 宏观经济管理, 2021, (9): 4-9.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13th Five-Year”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Great achievements and practice experience[J].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2021, (9): 4-9.]
- [2] 涂圣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8): 2-12. [Tu S W.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Goal orientation, key areas and measure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8): 2-12.]
- [3] 陈菲菲, 张祎彤, 仇焕广.“挪穷窝”后如何实现平稳过渡? 基于疫情冲击下易地扶贫搬迁户就业治理的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2, (2): 48-59. [Chen F F, Zhang Y T, Qiu H G. How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ion after “moving out of poor areas”? A study based on the employment governance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22, (2): 48-59.]
- [4] 魏瑞兄, 段小红. 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外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

-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为例[J]. 热带农业工程, 2022, 46(2): 55-59. [Wei R X, Duan X H. Study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A case study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Jingyuan County [J]. Tropical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22, 46(2): 55-59.]
- [5] 赵双, 李万莉.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困境与对策: 一个文献综述[J]. 社会保障研究, 2018, (2): 106-112. [Zhao S, Li W L.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relocation i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J].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2018, (2): 106-112.]
- [6] 张涛, 张琦. 新中国70年易地扶贫搬迁的就业减贫历程回顾及展望[J]. 农村经济, 2020, (1): 39-45. [Zhang T, Zhang Q. Review and prospect of employment poverty reduction in 70 years of new China in relocation for poverty reduction[J]. Rural Economy, 2020, (1): 39-45.]
- [7] 迈克尔·P·托达罗, 著.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 印金强, 赵荣美, 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Michael P 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hird World[M]. Yin J Q, Zhao R M, Trans. Beijing: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1992.]
- [8] Bhaiseni B. Poverty as a threat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Zimbabwe[J]. Afric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7, 7(2): 25-29.
- [9] 黄祖辉, 宋文豪, 金松青. 迁移式扶贫的经济社会评价: 研究与讨论[J]. 社会科学辑刊, 2023, (3): 142-150. [Huang Z H, Song W H, Jin S Q. Economic and social evaluation of migrant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and discussion[J].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23, (3): 142-150.]
- [10] 杜发春. 国外生态移民研究述评[J]. 民族研究, 2014, (2): 109-120 [Du F C. Review of foreign studies on ecological migration[J].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4, (2): 109-120.]
- [11] 王冬雪, 张会萍. 无土与有土安置对移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及群体收入分异: 基于宁夏“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区948份调查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9): 45-52. [Wang D X, Zhang H P. The impact of land settlement policy on immigrant's income and income gap among different groups: Ca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ingxia Province[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5(9): 45-52.]
- [12] 刘明月, 冷淦潇, 冯晓龙.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 “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展望[J]. 农村经济, 2021, (9): 9-16. [Liu M Y, Leng G X, Feng X 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low-up industry after relocating the poor: Review of the “13th Five-Year” and Prospect for the “14th Five-Year”[J]. Rural Economy, 2021, (9): 9-16.]
- [13] 马明, 陈绍军, 陶思吉. 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应与生计发展研究: 以三区三州怒江州地区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10): 16-23. [Ma M, Chen S J, Tao S J.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and livelihood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Nujia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5(10): 16-23.]
- [14] 刘明月, 冯晓龙, 张崇尚, 等. 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5): 61-79. [Liu M Y, Feng X L, Zhang C S, et al.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J]. China Rural Survey, 2022, (5): 61-79.]
- [15] 朱永甜,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陕南三市1680份农户数据[J]. 资源科学, 2021, 43(10): 2013-2025. [Zhu Y T, Yu J.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farmers' income and income gaps: A case study of 1680 households in Southern Shaanxi[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10): 2013-2025.]
- [16] 黄志刚, 黎洁.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2, 44(9): 1905-1917. [Huang Z G, Li J. Impact of the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ing households[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9): 1905-1917.]
- [17] 王晓毅. 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J]. 人民论坛, 2022, (1): 10-17. [Wang X Y.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People's Forum, 2022, (1): 10-17.]
- [18] 时鹏,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 (4): 101-120. [Shi P, Yu J.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off-farm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switching Probit Model[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3, (4): 101-120.]
- [19] 时鹏, 王倩,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及效应: 基于陕南3市8县1712个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2, 42(2): 190-202. [Shi P, Wang Q, Yu J. The impact of ex 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712 households' data in 8 counties of 3 municipalitie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2): 190-202.]
- [20] 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 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特征与后续扶持的路径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12): 88-102. [Research Group of Wuhan University on Follow-up Support for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ath selections of the follow-up support[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12): 88-102.]
- [21] 郭华, 黎洁. 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 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7): 149-156. [Guo H, Li J. Impact of urban resettlement on the livelihood activities of rural resettled households in South-

2023年12月

- ern Shaanxi Province with method of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CEM)[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 29(7): 149-156.]
- [22] 刘金龙, 金萌萌. 易地移民搬迁能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吗? 基于陕南S县的调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7(2): 32-43. [Liu J L, Jin M M. Can the resettlement program achieve the goal of ‘Immigrant out, Settling down and leaving out from the Poor’? Based on a case of s county in Southern Shaanxi[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37(2): 32-43.]
- [23] 邬黎明, 罗桢. 扶贫易地搬迁移民后续就业扶持措施: 基于湖北秦巴山区的调查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3(4): 131-137. [Wu L M, Luo Z. Follow-up employment support measures for the relocated immigra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Qinba Mountain Area in Hubei Province[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3, 43(4): 131-137.]
- [24] 李聪, 高梦, 李树苗, 等. 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7): 150-160. [Li C, Gao M, Li S Z, et al. Impact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Evidence from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s in Shaanxi Provinc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1(7): 150-160.]
- [25] 张会萍, 罗媛月. 易地扶贫搬迁的促就业效果研究: 基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就业质量的双重视角[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 (2): 13-25. [Zhang H P, Luo Y Y.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on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transfer and employment quality[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21, (2): 13-25.]
- [26] 张翠娥, 陈子璇. 家庭负担、性别分工与贫困劳动力就业: 基于湖北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 32-39. [Zhang C E, Chen Z X. Family burde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of poor labor: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in J County, Hubei[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 32-39.]
- [27] 国家乡村振兴局. 易地扶贫搬迁 960 多万人迎来新生活[N/OL]. (2022-08-15) [2023-08-04]. https://www.nrra.gov.cn/art/2022/8/15/art_624_196232.html.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Bureau. Relocation of 9.6 Million Peopl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Ushering in a New Life[N/OL]. (2022-08-15) [2023-08-04]. https://www.nrra.gov.cn/art/2022/8/15/art_624_196232.html.]
- [28] 吴嘉莘, 熊吉安, 杨红娟.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对生计的影响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2, (4): 129-138. [Wu J S, Xiong J A, Yang H J.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armers’ poverty-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livelihood in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J]. *China Soft Science*, 2022, (4): 129-138.]
- [29] 尹俊, 孙博文, 刘冲, 等.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 基于S省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J]. *经济科学*, 2023, (3): 185-204. [Yin J, Sun B W, Liu C, et al.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evalua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ject: Analysis based on the micro-tracking data of poor households from three counties in S Province[J]. *Economic Science*, 2023, (3): 185-204.]
- [30] 西部决策网. “十三五”西部易地扶贫搬迁总人口达 779 万[N/OL]. (2021-05-12) [2023-08-04]. <http://www.xibujuece.com/chengshi/shaanxi/zhonghe/2021/0512/95335.html>. [Western Decision-Making Network, The People Relocated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in the Western Region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Reached 7.79 Million[N/OL]. (2021-05-12) [2023-08-04]. <http://www.xibujuece.com/chengshi/shaanxi/zhonghe/2021/0512/95335.html>.]
- [31] 张璟, 刘晓辉. 出口产品分散化与汇率制度选择[J]. *世界经济*, 2018, 41(8): 51-76. [Zhang J, Liu X H. Export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exchange rate regime choice[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8, 41(8): 51-76.]
- [32] 刘启明, 邱斌, 孙少勤. 地区出口集聚、融资约束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决策[J]. *国际经贸探索*, 2023, 39(6): 4-19. [Liu Q M, Qiu B, Sun S Q. Regional export agglomeration,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export decision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2023, 39(6): 4-19.]
- [33] Angrist J D, Pischke J-S.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4] 王阳, 贾晋. 智能手机与农户创业决策: 基于中国农村家庭数据的实证[J]. *软科学*, 2021, 35(10): 138-144. [Wang Y, Jia J. Smartphone use and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rural household[J]. *Soft Science*, 2021, 35(10): 138-144.]
- [35] 喻开志, 王裕韬, 邹红. 迁而不工: 子女随迁与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J]. *统计研究*, 2022, 39(2): 64-79. [Yu K Z, Wang Y T, Zou H. Child migration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migrant mothers[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22, 39(2): 64-79.]
- [36] Iacus S M, King G, Porro G, et al. Causal inference without balance checking: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J]. *Political Analysis*, 2012, 20(1): 1-24.
- [37] 白云丽, 曹月明, 刘承芳, 等. 农业部门就业缓冲作用的再认识: 来自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6): 65-87. [Bai Y L, Cao Y M, Liu C F, et al. A recognition on the buffer rol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evidence from off-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 (6): 65-87.]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employment of farmers lifted out of pover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9 provinces and 11 counties in western China

ZHANG Huanbing, ZHANG Liq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follow-up support work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nsolidate and build the gain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Knowing whether out-of-poverty farmers can obtain employment after relocation and what kind of employment they can obtain, can provide useful policy references for follow-up support work. **[Methods]**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field survey data of farmers lifted out of poverty in 11 counties of 9 provinces in western China in 2021.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are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employment of farmers lifted out of poverty.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n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ources, resettlement types, and family status of relocated farmers. The sources of employment for relocated household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resettlement types and family status, were further discussed.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Reloc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agricultural labor of farmers lifted out of poverty,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2) Dividing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to public public welfare position and market-based job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employment of farmers lifted out of poverty in public welfare position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market-based employment. (3) Differenti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public welfare employmen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urban resettlement households, and the market-based employment of urban resettlement households faces greater challenges. After the relocation, the employment of public welfare positions for households with asset deficient and human capital deficien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employment of public welfare positions for households with compound deficiencies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In addition,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market-based employment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family status have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his study holds that the employment ability of relocated farmer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we should adhere to a policy that emphasizes both employment support and guidance, focus on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skills of relocated farmers, and provide classified policies and targeted assistance to special relocated groups, so as to stimulate and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relocated farmers lifted out of poverty.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ublic welfare position; market-based employment; resettlement type; family status;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